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发展的迷思 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瑞士〕吉尔贝·李斯特 Gilbert Rist 陆象淦/译

LE DÉVELOPPEMENT

Histoire d'une croyance occidental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发展的迷思

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LE DÉVELOPPEMENT

Histoire d'une croyance occidentale

〔瑞士〕吉尔贝·李斯特 Gilbert Rist 陆象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 (瑞士) 李斯特 (Rist, G.) 著；
陆象淦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ISBN 978-7-5097-2584-9

I. ①发… II. ①李… ②陆… III. ①经济学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3476 号

·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

发展的迷思

——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

著 者 / [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

译 者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责任编辑 / 董风云 段其刚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白桂华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5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305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584-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0-740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国家图书中心的赞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Gilbert Rist

Le développement: Histoire d'une croyance occidentale (3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 2007,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本书根据法国政治学国家基金会出版社 2007 年版译出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学术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马 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王逸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冯 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教授
爱德华·弗里德曼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
刘 东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刘树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
朱云汉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学部委员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苏国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陆象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顾问，研究员
周 宪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晓虹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俞可平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
俞吾金 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介厚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徐友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部长、人文学院教授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研究员
黄 进 武汉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谢寿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编审
韩冬雪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译 序

——“后发展”的呼喊

“发展”是当代基本问题之一，用一些论者的话来说，“发展”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发展问题的著述多不胜数，新论迭出，观点多样，学派林立，从“新发展哲学”到“依附论”，从“自力更生”理论到“另一种发展”，各辟蹊径，争论不断。同时，随着国际形势和时局的演变，作为全球模式的发展战略和目标也不断更新，全球或地区一次又一次峰会的决议和宣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主持和组织的一份又一份发展报告，从1951年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到世纪之交的《千年发展宣言》，发明了诸多界定发展的形容词，如“真正的发展”、“良性的发展”、“整体的发展”、“符合希望的发展”、“以自己的力量为中心的发展”、“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人道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等，蔚为大观，反映出政治风向和社会—经济思潮的微妙转换。然而，不同学派和不同时期的论说虽然在界定发展概念的含义、发展的进路和模式、论证的重点等方面千差万别，就主流观点而言无不肯定发展的必要性，特别是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乃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和繁荣的不二法门，并在强调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必须涵盖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资源、环境、生态等多重关系的同时，坚持认为“必要的”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至于作为工业化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恶果”出现的资源、生态、能源、气候等一系列当代危机，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减缓、克服乃至避免的，从而保障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危机，只有通过发展本身才能解决。即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态度的“南

方委员会”，也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强调“深刻意识到以往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的局限，并越来越坚信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不能重复此类战略的老路”，因此反对“模仿式发展”，并认为“发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借以对自身做出评估并自己决定应该达到的目标的过程”，“现代化不应当背离一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外，政府领导人还应该关注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生产和付出多大的社会和生态代价”；另一方面又坚称必须通过“快速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实现“发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对于上述主流观点持怀疑、保留和批判态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近年来，有人断言这样的“发展”已经终结，或者说“为它起草悼文的时候正在降临”。在对于发展的批判论说中，吉尔贝·李斯特的《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一书以其文笔之犀利和论说之系统引人瞩目。作为设在日内瓦的发展研究学院的名誉教授和欧洲—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负责人，李斯特强调必须从“发展”理念形成的源头和演变过程本身，来揭示其实质。在他看来，借用自生物学的“发育”或“成长”一词的发展，作为西方的一个信仰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历史观，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变形”，特别是进化论的点化，如同进步理念一样形成成为一种自然观、社会观和“天然”信念。就当代而言，1949年美国杜鲁门的国情咨文，亦即当时的报纸所说的“第四点计划”发明了“欠发达”一词，导入了“发展”与“欠发达”之间的一种新颖关系，改变了发展概念的意义。“欠发达”概念的出现不仅表明在走向最终目标的进程中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理念，而且特别强调激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它不仅肯定事物正在“发展之中”，而且断言我们有可能对事物加以发展。于是，发展有了及物的意义，而“欠发达”被视为一种“天然”存在，而造成不发达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征服占领、殖民统治、民族压迫、资本的剥削和掠夺、不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等，则被一笔勾销。李斯特着重指出，这种划分世界的新二分法显而易见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其基础则是强国肩负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观。将整个人类纳入被设定为人人分享文明的条件的“发展”范式，促使“发展”成为一个“天然的”普世价值。惟其如此，发展研究及其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人类学等——一时成为国际显学。以“发展”为标榜的广泛运动植根于西方想象力的这样一个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

助技术进步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来得到保障，人人终将从中获益。因此，“发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诺，是“自然的”、积极的、必要的和无可争议的。所有政治领导人、经济角色、公共和私人组织，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众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地皈依这一信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现实与希望渐行渐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出并推行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即使不能说是失败，也是乏善可陈的，其名称和主题一次又一次的变换即是证明。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愈益扩大。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气候危机、金融危机接踵而至，波及全球，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害尤甚。其原因究竟何在？李斯特在书中剴切地指出，毋庸置疑，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享有的整个福利获得了惊人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存变得比较容易，生活的希望总的说来极大地加强。然而，居于“发展”体系核心的依然是老一套的过时观念，即“发展”能够借助被认为是无限的经济增长而惠及全球，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特别是对于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尽管事实说明这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两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依靠变卖“家底”，也就是说依靠挥霍由不可再生资源构成的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本”来保障其生活的优裕地位的。与一般接受的观念相悖，西方的“发展”处方最简单不过：无节制地增加能耗量，其中尤以消耗煤炭、石油、天然气、铀的“内燃机”的发明为最，由此着手，可以加速渔业、农业和矿业等其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供垄断能源的国家渔利。诚然，凡此种种还取决于投入研究的资金、新技术的发明、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诸多因素，但促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能源供给的能力，而不是相反。否则，如何解释与控制能源相关的种种冲突乃至战争？今天，全球 20% 的人消费了我们这个星球的 80% 的资源，而且为了维持体系的运转不得不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再动员至少 4 倍于此的额外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环境负担不了这样的重荷。但经济增长的需要掩盖了一切，无论是熵的增大、自由能量向受限能量的转化、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或者大气和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等严重问题的解决，大多停留在一纸空文或者口水战上。为了维持当前体系的运转和生存，“发展”的信仰需要人人都能看得见的征象，而经济“奇迹”和技术“突破”圆满地发挥了这样的效应。然而，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实情隐藏在没有立刻显现的阴影背

后，生物多样性的锐减、气候的剧变、放射性的恶果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此，一方面是宣称“发展即是生命”并以平衡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另一方面是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现象所显示出的日益加剧的不平衡和灾难的紧迫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和不可调和。主流政治经济学理论竭力淡化现实，而只展望未来的进步，可谓身在俗世，神往仙山。同时，这种理论没有能力严肃预测未来几代人的“市场需求”，只能通过即时的线性认识来描绘业绩。人们一味宣称相信“历史的意义”，到头来却只能抹杀历史。

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以逐利为宗旨的市场机制。李斯特认为，实质上，经济增长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和追逐利润的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一场来势汹涌的全球化运动更促使国家调控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建立再分配机制的一切行动归于失败。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势地主导一切，而其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增长。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和速率成为一切国家引以为豪的实力和竞争力增长的主要依据，更是跻身于世界大市场的敲门砖。各种炫富和时尚排行榜喧嚣于市。有人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将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编织着最不同的人之间的越来越紧密的网络。通信手段的增多造成一种幻觉，以为人们无须从他们所在地移动就可以彼此接近。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危机今天也有了全球规模。但是，世界的这种“缩小”的斥力比合力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在渴望从市场的扩大中获取巨大利润的人与从中除了枷锁没有任何东西将失去的人之间，天平是不平衡的。随着把世界割裂为两个部分的这道鸿沟的日益加深，不仅是有钱人可以尽情消费，而且将迫使受排斥的人们在必然与今天主流相悖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占统治地位的体系能否继续背离大多数人而安然若素？因此，李斯特断言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成为一个趋于枯竭的过时范式。在近几十年的进程中，既然一切“发展”政策造成了物质和文化上的弱肉强食，巧取豪夺，那么走这条路是徒劳的，其结果只能是贫困和不平等的加剧。“发展”犹如一颗陨落的星星，人们依然感觉到它的余辉，尽管它早就已经熄灭。“后发展”时代正在来临。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李斯特看来，“后发展”观念支持者们的批判矛头针对的是作为西方信仰的“发展”观，因为它是一种迷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界未来观，一种表述模式，或者说是决定着世界全盘市场化实践的话语形态。关键问题不

在于这个或那个“发展计划”的成败，而在于如何确立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切居民及其后代平等地和谐共处的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斯特的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回顾“发展”历史的充实依据和参照，而且激发我们用社会批判的利器进行反思，走出盲信的迷津。这也许是“后发展”新时代的呼喊，尽管还很微弱。

陆象淦 2011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第三版序

十年前，大家可能普遍认为“发展”的步伐即将放缓，对我们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前景的估计将从此走向比较实用或者比较“现实主义”，扬弃作为主流经济学说基础的进步神话和种种过时假设所支撑的幻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生态问题抑制了不久之前占据压倒地位的乐观主义，无论是北方或者南方，无论是政治舞台上的左派或者右派，却依然始终将经济增长视为改善所有人命运的万灵妙药，其结果是令人担忧的气候危机和世人力图缩小的不平等愈趋严重。控制着这种制度并从中获利的少数人对此不容置疑，他们津津乐道于宣扬人人都能分享财富。只要大言不惭地说不公平是暂时的，就足以使人相信这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状态的忧虑变得越来越急迫，虽然“发展”不像以往那样频繁地挂在人们嘴边，却披上了所谓“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外衣，提出了从现在到 2015 年将极端贫困减少一半的计划，据说这与我们要促使其摆脱市场规律的“世界公共财富”休戚相关。在主流思潮之外，增长本身成为争议的话题，尽管起初只是相当胆怯地申辩不可能有无限的增长，稍后则随着降低增长派阵营的形成而更为理直气壮。一些“新发展派”始终力图保持对于“另一种发展”的信念，也就是说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最终实现诞生于 19 世纪的民主和群众性参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义无反顾地鼓吹所谓的“后发展”理论。随着早已形成的对于主流经济范式的批判的扩展和更具针对性，值得讨论的新进路很多：今天占主导地位的过分简单化的世界观难道不正是大多数当代社会深陷其中的困局的源头吗？

值本书列入其中的丛书修订再版之际，我们增加了新的一章来阐述今天广泛争论的这些问题，并将前一版的后记改成名副其实的独立的一章。最后，根据最新的统计修订了一些数据，删除了一些并非必不可少的议

论，对于结论也做了很大修正。

笔者意识到这些修改增加了对敝人的立场进行评论的人们——不论是赞成或者反对，敝人都感到不胜荣幸之至——的负担，因为新的文本显然不同于以前的版本，特别是最后一部分。但是，笔者不能放过对正在进行的争论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尤其是以自己作为通常是这种争论见证者的身份。不过，读者尽可以放心，笔者的信念始终没有变。对于我们来说，对“发展”的批判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个受人膜拜的术语继续不断地被用来激发起种种不切实际的希望。

吉尔贝·李斯特

2007 年 10 月

第二版序

自五年前出版以来，本书引起了某些争议。对此，如何能不感欣慰呢？如果说谦虚促使我们忽略那些因它阐明了与原本应有意义相悖的“发展”一词今天的实际含义而给予的褒奖之词，那么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之声可以分为两大阵营。

首先是所谓容忍派。这些人颇为愤懑地描述以“发展”之名冠冕堂皇进行的种种行动并将之或多或少归结为市场在全球的扩张，与此同时又容忍“发展”所激发起的巨大希望变得暗淡的悲剧。^①然而，为什么不应该承认最崇高的事业往往引发某些悲剧的结果呢？试举一例：曾经梦想财富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按需分配”的人们，梦醒时分看到的不仅是列宁所说的苏维埃和电气化，而且还有物质的匮乏和古拉格集中营。如果历史可以在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那么为什么不如法炮制，指明将普遍幸福的希望与在“发展”的名义下加剧不平等并推行全世界无所不在的商品化的具体行动之间截然分开的鸿沟呢？

其次是所谓忠信派。这些人根本不考虑如何改善他人的命运——尽管有时获得某些成绩，而且唯恐一旦宣布“发展”终结，就会促使始终为数众多的穷国急切需要的援助进一步减少。希望“发展”或者希望活得更好，难道不合情合理吗？关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提醒读者的是，本书既不想评价旨在实施“发展”的合作，也不想谴责国际援助。不过，如果说这些行动是必要的，那么它们就经济体系关于不可通融的逻辑所要求的诸多措施而言，始终是边缘因素。博爱之心是无可怀

① 参见塞尔日·拉图什《全球市场的风险》（Cf. Serge Latouche, *Les dangers du marché planétaire*, coll. *La Bibliothèque du citoyen*,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1988, 132p）。